

2014-2015 年臺灣戰後政治史研究的若干面向*

Some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of Postwar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2014-2015

李福鐘 (Li Fu-chung) **

依臺灣歷史學界當今的研究趨勢和風氣，新史料永遠可以帶動新的研究成果，似乎是不爭的事實。儘管新的研究成果不見得必定仰賴新史料。當然，新史料並不一定意味會創造新議題，即使是已經有漫長研究歷史的某些老題目，只要有新史料，一樣可以產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成果。2014-2015 年在戰後臺灣政治史和外交史領域，呈現出來的狀況就是如此。包括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有關 1950 年代冷戰情勢下的政治、外交情勢，儘管都不是新話題，但是因為新的、關鍵性史料的出土，使得歷久不衰的這兩個研究領域，一樣有新的成果出版，而且足以帶動新的思考，以及未來進一步開展對話或深入探討的可能性。¹

一、二二八研究

2013 年 11 月 29 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主辦的「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研討會，論文發表人基本上皆使用了該所典藏的一

批二二八事件新購史料「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²由此完成的 7 篇論文，2014 年下半年由《臺灣史研究》期刊以兩期「專號」分別加以發表。³ 論文分別是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蔡秀美〈二二八事件期間消防隊員的角色〉、蘇瑤崇〈謊言建構下的二二八事件鎮壓之正當性：從「大溪中學女教員案」論起〉、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侯坤宏〈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角色〉、歐素瑛〈二二八事件期間縣市首長的角色與肆應〉，以及劉恆玟〈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為中心〉。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自 1988 年兩蔣政權落幕以來，隨著各種政府部門檔案資料的大量公開、目擊證人的口述訪談，以及諸多相關文獻的彙集整理，二十餘年來其實已經累積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當然，在既有史料基礎上，依然有相當多的相關議題可以作進一步探討。就以《臺灣史研究》2014 年的兩期專號中刊登的 7 篇論文為例，並非各篇都必定仰賴中研院臺史所新近

* 本文係 105 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1 本文限於篇幅，主要介紹 2014-2015 年間正式出版之戰後臺灣外交史、二二八研究，以及系列出版之蔣介石研究相關作品，不及於同時期發表之其他國內政治史議題，以及學位論文。

2 該批檔案係中研院臺史所 2008 年 4 月自民間購得，原係某匿名情治人員所有。相關內容及緣由介紹，見許雪姬，〈「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的解讀與研究〉一文，《臺灣史研究》21: 4 (2014.12): 187-217。

3 卷期編號分別為《臺灣史研究》21: 3 (2014.9) 和 21: 4 (2014.12)。

收藏的檔案，例如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一文，⁴其主要史料依然在於國史館十餘年前所出版之十餘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國史館所藏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臺灣文獻館所藏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於1990年代初所出版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等等。這說明出版或公開已有一段時間的舊資料，其實仍有相當程度的研究挖掘空間。

當然，新出土的保密局史料，確實有助於在更多細節上提供佐證，尤其是保密局臺灣站派駐各地的「通訊員」，在事件過程中持續向上級報告在地狀況，⁵透過匯報的內容，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分析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情報單位在臺灣情資網絡的構建狀況，而這些所謂通訊員報告內容的性質及其真實度，和日後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在事件中所作所為的關聯性等等，都是情勢演變的重要影響因素。保密局臺灣站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站長林頂立、直屬通訊員許德輝兩人的關鍵角色，在1990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中，早已有諸多披露。⁶而今藉由新的檔案史料，研究者可以在過去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提供更豐富的細節和佐證，這自然是新史料最大的作用。

事實上不止保密局臺灣站，歷來在二二八事件研究中必然會提到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在這一次由新史料所帶動的新研究成果中，同樣不缺席，而且再次說明：即使是舊議題、運用舊資料，依然可以提出新的研究成果。當然，在這過程中，新史料一樣扮演更多的細節提供、說明和佐證的角色。侯坤宏的〈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角色〉一文，藉著保密局在各縣市、鄉鎮布建的所謂「通訊員」上呈的報告，正好將原本不夠詳盡的各地處委會組成人員，作更進一步清晰的呈現。這當然主要歸功於保密局在各地的各級通訊員們，賣力蒐集並密報各地處委會成員名單。之所以如此，實係保密局早就將處委會視為帶頭作亂的在地有力人士。因而不久蔣介石增派部隊來臺，處

委會成員首當其衝成為情蒐和密謀鎮壓的對象。從中研院臺史所收藏的這批「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研究者更清楚看到了情治部門如何早早將二二八事件導向預期的悲劇結局。

整體來看，因2013年11月在中研院臺史所召開的「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學術研討會而發表的7篇論文中，侯坤宏這篇有關各地處委會角色的重新探討，是運用該批保密局新史料最多也最直接的一篇，其他各篇主要還是依靠1990年代以來長期累積的各種文獻資料，但仍然可以對二二八事件之諸多面向作更深入的鋪陳及表現，成為在既有史料中開拓新議題、新觀點的成果。例如陳翠蓮的〈「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一文，事實上就是在其二十年前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一書基礎上，再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軍統局、三青團、復興社，以及戰後在臺灣成立的義勇糾察隊等國民黨周邊組織，作更多介紹，並以陳逸松和劉明二人為背景，說明戰後初期臺灣政治活躍人士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的合作與矛盾。該文行文方式因故事性極強，讀來頗有戲劇感，尤其關於戰後臺灣人處在國民黨內部權力的競逐和衝突夾縫中的危殆情境，寫來栩栩如生。

除了2014年下半年《臺灣史研究》兩期專號所刊載的7篇論文，2014年至2015年間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尚有其他論文發表，按照出版時間先後次序，分別為劉熙明〈二二八事件中涂光明刺殺彭孟緝真實性之平議〉，發表於《臺灣風物》第64卷第1期（2014年3月）；溫秋芬〈台灣人旅京滬團體228救援紀實〉，發表於《臺灣史料研究》第43期（2014年6月）；天江喜久〈朴順宗：二二八事件中朝鮮人／韓僑的受難者〉，發表於《臺灣風物》第64卷第3期（2014年9月）；以及曾文亮〈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兼論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與法律關係〉，發表於《臺灣史研究》第22卷第4期（2015年12月）等4篇。

劉熙明〈二二八事件中涂光明刺殺彭孟緝真實性之

4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21:3（2014.9）：1-64。

5 同上註，頁29-36。

6 例如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平議〉一文，特別針對二二八事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之說詞，抽絲剝繭比對各方說詞進行考證。彭孟緝在3月6日發給行政長官陳儀的電報中，即已指控高雄民軍代表涂光明在3月6日上午的談判中意圖拔槍行刺他，在制伏涂光明後，當天下午遂以此為口實出兵鎮壓高雄地區民軍，造成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重大傷亡。劉熙明的結論，認為涂光明隨身帶槍，但並未企圖行刺，反而是彭孟緝被涂光明等人所提出的九條「和平條款」所激怒，藉口將涂光明逮捕並槍決。儘管劉熙明這篇論文並未引用新史料、新事證，但針對過去諸多文獻所留下的重重疑點，全面加以分析釋疑，尤其突出事件本身的歷史重要性，再次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儘管已經有近三十年歷史，但因事件影響深遠，涵蓋地域普及全臺，因此仍有不少深入研究探討的可能性。

天江喜久〈朴順宗：二二八事件中朝鮮人／韓僑的受難者〉一文也是同樣情形。有關二二八事件期間在臺灣遇害的日本人和韓國人，近年來陸續有學術研究和媒體報導揭露。任教於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的天江喜久，特別針對居住於基隆的朝鮮人朴順宗遇害經過進行考證，說明他在3月11日因事出門，很可能恰好遇到在基隆市區進行屠城的國民黨軍隊，從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199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針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進行政府賠償，朴順宗也因為不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申請未獲通過。

溫秋芬的〈台灣人旅京滬團體228救援紀實〉一文，主要是介紹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人在上海的楊肇嘉，由他所保留的個人檔案資料，包括大量上海當地剪報、臺人旅滬各團體當時公開發表的聲明文件，以及個人日記等。這篇文章性質上屬於史料介紹，而楊肇嘉的這批個人檔案，相信將有助於對二二八事件前後旅居上海、南京的臺灣人社團作進一步研究。

曾文亮〈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兼論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與法律關係〉一文，試圖從1947年年初當時國民政府的法體制，檢討二二八事件對臺灣進行軍事鎮壓及實施軍事審判的合法性。此一取材

角度在過去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中雖也偶有觸及，⁷但因為國民政府歷史屬於傳統所謂「民國史」的領域，與19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戰後臺灣史領域始終不曾深入交流互動，因此有關1947年之際在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之歷史研究，與二二八研究在學術上一直都處在兩個不同的軌道上。二十餘年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既成研究成果，一直未能真正正視1925年至1947年間的國民政府研究。曾文亮這篇文章，儘管試圖分析1947年之際國民政府的法秩序與政治潛規則，但因為欠缺對國民政府的了解，在結論上仍有進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間。由此亦可窺見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未來仍有相當的議題和領域需要探究。

二、蔣介石研究與1950年代臺灣政治史

如果說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在成果數量方面成為2014至2015年戰後臺灣政治史的一大熱點，那麼有關1950年代圍繞著蔣介石政府的內政、外交、軍事政策之研究，在數量上同樣不遑多讓，而且已經成為近幾年來戰後臺灣史的重要焦點。2014-2015年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集結成為兩本專書出版，一本是黃克武主編的《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2014年6月由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另一本是呂芳上主編的《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2015年10月由國史館出版。兩本書均是論文集形態，《同舟共濟》一書內含論文11篇，篇幅高達540頁；《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更收錄多達17篇論文，總頁數幾近800頁。由這兩本論文集的出版，可以看出事實上因為2008年至2016年間中央政府重新由國民黨執政，戰後臺灣政治史在研究出版的焦點議題上也出現了一番新的調整，偏向於強調1950年代蔣介石政府搬遷到臺灣初期，施政各方面的成績。這個新的研究特徵，與2000年至2008年間有關白色恐怖、威權體制、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臺灣國際法地位等熱門議題，明顯指向兩種

7 例如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

不同的方向發展；儘管，兩種有關戰後初期（尤其 1950 年代）臺灣政治史的論述方式，其實都各自呈現著一定程度的歷史真實。

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二二八事件，曾經為 1947 年至整個 1950 年代臺灣政治環境留下過深刻烙印；而同一時間，初來乍到驚魂未定的蔣中正政權，確實也嘗試在臺灣島上站穩陣腳，提出政績，以持續鞏固其統治。因此，從 2000 年至 2008 年某些一度熱門的研究趨勢，對照 2008 年至 2016 年另一種類型的研究方向的提出，可以說各擅勝場。很明顯的，在 21 世紀初的臺灣，戰後臺灣史的研究及出版狀況，仍然與政治上的政權輪替具備著高度的連動關係。

近幾年推動對於 1950 年代蔣中正政府的研究，其實主要由兩個政府機關出面組織，一是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二是國史館。其中尤其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近幾年連續出版了三本有關 1950 年代以蔣中正為核心的歷史研究論文集，分別是 2011 年的《遷臺初期的蔣中正》、⁸ 2013 年的《重起爐灶：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⁹ 以及 2014 年的《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¹⁰ 總計三本專書共收錄論文 31 篇，稱得上是近年來有關 1950 年代臺灣史的最大規模研究出版計畫。而這一波長達數年的寫作研究熱潮，還可以再上溯至 2010 年 12 月 2 日由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歷史系合辦的一場名為「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¹¹ 以及隨後數年間亦由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贊助，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

研究室一起合作展開的 5 場學術研討會。¹² 這一連串大型學術活動，帶動了最近五、六年來有關蔣中正在研究熱潮，除了前面提到由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所出版的三本專書，事實上另有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公司於 2011 年出版的《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¹³ 以及 2012 年由政大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的日常生活》。¹⁴ 在這個 2010 年以來研究趨勢的帶動下，2015 年 10 月國史館出版了這一系列的最後一本論文集《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¹⁵ 成為長達 5 年戰後臺灣史「蔣介石熱」的壓軸之作。

這一系列的出版品中，落在本文討論時間範疇內的，有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的《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以及國史館出版的《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兩本書。事實上，之所以促成這一波長達五、六年的「蔣介石研究」熱潮，其學術上的原因並不令人意外，就是因為 2006 年以來「蔣介石日記」的公布。這一批極具關鍵價值史料的出土，形成長達十年的 20 世紀中國史、戰後臺灣史熱門研究趨勢，再一次說明新史料足以帶動新的史學研究走向。

但正如上一節已經特別點明的一點：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並非一定仰賴新史料、新文獻，即使出版或公開已有一段時間的舊資料，其實仍有相當程度的研究挖掘價值。尤其，蔣中正的個人日記充其量代表著他個人對於當時發生在國內外以及政府內部、甚至家庭內部大小事情的看法或判斷，並非歷史真相的唯一解答。何況，蔣中正在日記中使用的語言經常十分曖昧、隨興，甚至以一種私密而紛雜的個人好惡情緒來書寫，在解讀的時

8 黃克武主編，《遷臺初期的蔣中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9 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10 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11 參照總統府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2992&rmid=514>（瀏覽日期：2016/11/24）。這次研討會的三十餘篇論文，最後集結成為《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一書。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

12 任育德，〈「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的回顧」學術討論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10（2016.6）：157-161。

13 王奇生等著，《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11）。

14 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

15 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臺北：國史館，2015）。

候，字面意義不見得等同於他的決策與判斷。拿「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引證時，最好仍必須搭配既有的史料、檔案，相互印證。否則，研究者很可能只是把蔣介石個人最原始或最直接的個人情緒，當作歷史事實看待。

由於《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以及《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兩本書合共收錄論文 28 篇，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討論，只能就筆者能力所及範圍，挑選若干具有爭議性或關鍵性的議題，加以評論。

以劉維開所著〈蔣中正處理毛邦初事件之研究〉一文（以下簡稱「劉文」）為例，這篇論文基本上旨在探討發生於 1950 年至 1951 年間的毛邦初案，當時空軍副總司令毛邦初赴美負責中華民國空軍對美採購，遭在臺北的空軍總部指控賬目不清、違法瀆職。劉文把梳事件來龍去脈，除了指出毛邦初與上級長官空軍總司令周志柔的個人權力恩怨外，內文主要在描述蔣介石個人如何處理兩名下屬互鬥的困擾。然而如此一來，最關鍵的問題反而混沌不清，即毛邦初何以敢於越級挑戰他的直屬長官周志柔？毛邦初在整件事情中的有恃無恐，最後甚至抗命不願回臺等等行徑，實在很難僅以其為蔣介石元配毛福梅族侄這層私人關係來解釋。當然，作者在文章中特別申明：「本文目的僅在探討蔣氏對於處理毛邦初事件的指示與作法，其他毛案相關問題，本文不擬討論。」¹⁶不過將最令人好奇的劇情排除在外，終究美中不足，而且讓論文停留在僅是案情細節鋪陳的層次。

相較之下，同書另一篇論文，趙席叟的〈1950 年代的蔣介石與顧維鈞〉（以下簡稱「趙文」）有關蔣介石的宮廷政治方面的描述，就有趣多了。顧維鈞是中華民國 1949 年遷臺之際的駐美國大使，同時又堪稱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傳奇的外交官員。然而這樣一位專業又資深的外交官，在面對蔣中正寧可任用私人親信而不願信賴

正常外交體制的決策作風，經常有苦難言。趙文將這個層面的史實過程描寫得十分傳神，而其中也觸及到了毛邦初事件的關鍵，也就是毛邦初其實甚受到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支持，趙文寫道：

在毛（邦初）倒臺前很多軍援事件上，他都與顧（維鈞）等使館人員持反調，尤其宋美齡 1950 年回臺灣前那次的爭取軍援，毛常越過顧直接向宋美齡報告或接受指令……。¹⁷

至於蔣介石何以經常不信賴他的外交官，而寧可靠著孔宋家族成員操縱對美國的關係？趙文也有進一步的解釋：

自 1944 年開始他（按：指陳之邁）就頻頻與陳布雷通信，……當宋美齡在美國時，他不僅直接向宋美齡報告，平日更透過陳布雷向蔣報告一切在美的活動，他得自非官方管道的美方訊息，也會透過皮宗敢或是陳布雷讓蔣掌握，蔣也透過陳布雷去指揮陳之邁在美的接觸對象與活動，而這些完全都是跳過外交部與駐美大使。呈現的就是蔣的領導風格，與對專業技術官僚的不尊重及對體制的破壞。當然這與蔣心中始終認為夫人是真的「美國專家」有關……。¹⁸

所以說毛邦初案最後釀成軒然大波，蔣介石自己偏好以「內朝」¹⁹的決策模式施政，甚至放任自己的妻子與外戚到美國率領一羣軍政人員大搞檯面下外交，難道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等到這起醜聞鬧上美國法院，經由媒體報導得沸沸揚揚，蔣介石才在日記中寫道：「邦初在美國喪心病狂，對於國家與政府詆毀，無所不至……為美國反華者所利用，以資摧毀我國家，其罪甚於賣國矣。」²⁰

這一點正是上文提到引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

16 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頁 4-5。

17 同上註，頁 498。

18 同上註，頁 484-485。

19 「內朝」概念借自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一書。見徐復觀，〈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收在氏著，《兩漢思想史·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六版），頁 203-280。

20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9 月 5 日、9 月 8 日。轉引自劉文，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頁 23。

時必須十分小心的理由。蔣的日記充其量做為他個人抒發情緒及表達一己意見的地方，但萬萬不能當作歷史解釋的持平之論。就像毛邦初後來跑到紐約尋求李宗仁支持，蔣中正在日記中破口大罵：「何天生此無恥之廣西子以擾亂我之心神，及再一思索則置之一笑而已。」²¹其實，李宗仁以自己仍為合法「代總統」，而蔣中正「復行視事」違反憲法的說詞，並非全無道理。

不過，「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確實有助於創造或重啟諸多新的話題暨陳年舊聞，並且有助於為數可觀之學術論文的產出，殆為不爭事實。《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及《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二書的出版，以及 2010 年以來新一波的蔣介石研究熱潮，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除了毛邦初案，上述二書尚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議題與論點，值得稍作陳述。例如王文隆所寫的〈國際參與的調整〉²²及〈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²³二文，對於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初期，在以對美外交為主要工作項目的外交環境，作了背景的分析介紹。屬於類似性質的文章還有許峰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1950-1960）〉一文，²⁴主要以作者過去所發表有關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費攤付問題之研究為基礎，再作進一步的延伸擴充。

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 1950 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一文，²⁵誠如作者於篇首開宗明義點出：「檔案與資料甚多，研究者較少。」究其原因，應該在於事件最啟人疑竇之處，是蔣經國涉入事件的程度有多深，尤其

他指揮的救國團究竟有沒有扮演動員示威群眾的推手。一旦這個疑點無法從資料中獲得釐清，研究者大費周章進行梳理的可能性和動機自然減少。那麼林桶法這篇論文究竟有沒有針對這個問題作出更清晰的揭露？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作者基本上儘量利用國史館所典藏的蔣經國總統檔案，試圖還原在那幾天裡頭蔣經國的行蹤，最後結論仍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蔣經國或他所領導的系統人馬涉入。所以，這篇文章究竟是幫蔣經國辯誣？或者是將問題又拋回原點？

不過無論如何，這篇有關劉自然事件的研究，至少是儘可能運用了目前國內所能看到的史料，針對事件發生的經過細節、蔣經國的角色，以及美國在臺軍事顧問團等等問題，作了少見的詳細鋪陳，讓未來的相關研究有一個起碼的實證基礎。

至於兩本論文集收錄的其他文章，大多是各相關主題的史事鋪陳，本文限於篇幅，不再一一進行討論。但特別想一提的是吳俊瑩的〈戒嚴體制下的臺灣〉一文。²⁶有關戒嚴法、保安司令部暨警備總司令部、白色恐怖、威權體制等一系列問題，從 2000 年以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發表，大多數屬於政治叛亂案件的個案研究，間亦有針對兩蔣威權統治的體制與法制面分析，數量有限，而且大多僅側重於微觀層面之分析，並未出現統整性的論述。²⁷吳俊瑩這篇論文篇幅雖然不小，總字數應該在六萬字以上，但以這樣的篇幅，自然尚不可能對兩蔣威權統治提出一個完整的、框架性的論述。但至少這篇論文在一些非常基礎的法制面、制度面和歷史面，作

21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12 月 6 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2015），頁 752。

22 收在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頁 403-445。

23 收在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頁 433-463。

24 收在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頁 447-495。

25 收在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頁 207-262。

26 收在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頁 135-195。

27 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參閱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台灣歷史學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9）；陳龍志、邱榮舉、倪子修總編輯，《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研討會》（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6）；倪子修總編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1）等書所收錄之論文。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臺北：稻鄉出版社，2014）一書，則對戒嚴法下的軍事審判制度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另外尚有不少期刊論文、專書篇章、學位論文係屬於此一領域之出版品，惜以本文篇幅，尚難針對此議題整理出真正完整之參考書目。

了足夠細膩的考證。包括 1949 年 5 月 20 日以來有關戒嚴令頒布的程序瑕疵問題、保安司令部與警備總司令部的組織變革，以及戒嚴頒布後對臺灣民間社會的權利剝奪等等，其中自然亦包括非現役軍人因政治案件必須遭受軍事審判的相關規範和法律過程。吳俊瑩這篇論文的發表，應該可以為日後的白色恐怖歷史研究，提供更清晰可辨的史實基礎。

在結束本節有關 1950 年蔣介石政府之相關研究以前，有必要稍微介紹一下 2014 年由阮大仁出版的《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一書。²⁸ 這本書雖然有若干篇章屬於歷史考證、史事研究，但亦有相當於一半篇幅屬於史論，甚至是個人所知聞之政壇秘辛回憶錄。因為作者阮大仁的尊翁阮毅成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阮大仁從小耳濡目染聽聞諸多決策內幕，因此本書揮灑寫來，體例風格自不同於一般學院式的論文寫作。然而就其提供個人歷史觀點、史事研究心得，以及跳脫凡事以史料為真憑實據的學術寫作框架，本書對於了解 1950 年代蔣介石政權的若干關鍵細節與事件原委，還是提出了饒富趣味的一家之言。

三、日本之臺灣研究

2014 年日本學界突然湧現一股對於臺灣研究熱潮，有多篇論文和專書集結出版。稱之為熱潮，相信應是多年累積醞釀的結果。首先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東洋文化》期刊，在 2014 年出版的第 94 號特集，以「繁榮與自立的兩難——後民主化時代臺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題，一口氣發表了 8 篇針對臺灣政治經濟情勢的分析。嚴格來說，這 8 篇論文並不屬於歷史研究的範疇，而是對近年臺灣政經情勢的分析，例如該

特集主編松田康博所撰寫的〈馬英九政權下的中臺關係（2008-2013）——從經濟的依存到政治的依存？〉一文，從標題都可以看出並不屬於歷史學者一般所理解的史學研究。再像是同一特集由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客座研究員黃偉修所撰〈關於馬英九政權大陸政策決策過程與中國國民黨之角色——以國共論壇為例〉，亦為同一性質之論文。不止討論臺海兩岸關係的文章並非歷史領域論文，其他關於日臺關係的論文原則上亦非史學作品，像是該本特集中，法政大學教授福田円所寫的〈後民主化的臺灣與日本——關係之制度化與緊密化〉，和佐藤幸人寫的〈東亞經濟變動與日臺商業結盟〉，也都屬於外交政治領域而非歷史學領域的研究。此外還有高原明生的〈與中臺關係安定期相關的日中關係之開展〉，基本上在於探討日中關係，臺灣問題係作為背景因素被提出。

這一期《東洋文化》中唯一較具有史學特徵的作品，是若林正丈的〈現代臺灣的「中華民國」——例外民族國家之形成與國家性〉這篇文章。²⁹ 若林正丈在文章中所欲探討的主題和其所展開的論述，其實與他自 2008 年出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³⁰ 一書以來所關心的問題是一致的，即以「遷占者國家」（Settler State）的概念來解釋中華民國自 1949 年之後立足臺灣所形成的政權性質，同時分析「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過程。若林正丈近年來有關這一主題的論述，持續出現在他的多篇作品中，除了《東洋文化》第 94 號特集的特文外，由他所主編的《解讀現代臺灣政治》一書，³¹ 其中他所撰寫的代序文〈從臺灣歷史解讀〉，是有關其近年所持論述的又一次呈現。若林正丈在這篇代序文的文末很清楚說明，這篇論文其實是在 2013 年 8 月他所投稿《東洋文化》的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而成。³²

28 阮大仁，《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29 若林正丈這篇文章的標題及內容，提及“nation state”這個概念時所用日文漢字為「國民國家」，本文選擇使用中文「民族國家」作為譯名。

30 若林正丈，《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國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本書中文版由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書名則取作《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31 若林正丈主編，《現代台湾政治を読み解く》（東京：研文出版社，2014）。

32 同上註，頁 22。

由此看出，若林正丈在他近年的作品中，一再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作為一個「遲到」與「例外」的民族國家，試圖提出宏觀視野的歷史解釋。至於其解釋的周延性與適用性如何，仍待觀察臺灣學界如何作出理解及回應。

關於若林正丈所主編的《解讀現代臺灣政治》一書，除了他的代序文，另收錄有 6 篇論文，依序為小笠原欣幸〈由地方解讀臺灣選舉——雲林縣的事例〉、岸川毅〈從政黨系統變動之研究加以解讀〉、松本充豐〈從政黨組織研究加以解讀〉、清水麗〈從日臺關係史研究加以解讀〉、前田直樹〈從戰後美臺關係史研究加以解讀〉、松田康博〈從中臺關係之國家政治學加以解讀〉等。嚴格來說，除了清水麗的論文涉及到戰後以來臺日關係的演變，以及前田直樹的論文旨在論述臺美關係史，其他篇章和《東洋文化》第 94 期特集中的論文一樣，主要還是對於當代臺灣政治環境的解讀。從這個角度觀察，本節一開始所說 2014 年上半年日本學界突然湧現一批有關臺灣研究的出版熱潮，與其說是對臺灣特定歷史議題的重視，還不如說是對廿一世紀臺灣進入所謂「後民主化」時代以來，在政治、外交、經濟、中國政策等層面可能的新發展，所表現出來的關注。筆者大膽認為，這種關注恐怕也不會在 2014 年《東洋文化》的特集和《解讀現代臺灣政治》一書出版後即告結束。隨著西太平洋政治經濟局勢的新發展與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臺日關係勢必成為日本政界和學界不能忽視的一環，未來日本的臺灣研究極可能在這個背景下，有更進一步擴展。當然，這一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或許就像

2014 年的情況一樣，並非以歷史研究的方式表現，而係對當下臺灣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趨勢的分析解讀。

然而，本文作如此析論，並不意味過去這兩年日本學界在戰後臺灣史領域缺席，只不過，比起對臺灣現下政經與外交局勢的分析，史學研究相對來說較不那麼突出顯著。然而仍有數位長期耕耘臺灣史研究的年輕學者，依其專長撰寫了若干論文，例如長期關心「泰緬孤軍」歷史的若松大祐，在 2014 年便接連發表 2 篇戰後臺灣史的相關論文〈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之歷史觀〉及〈關於現代臺灣史的泰緬孤軍印象：顯示本土化不徹底之事例〉；³³對於蔣介石政府遷臺後之語言政策素有興趣之森田健嗣，亦在同年發表了〈關於戰後初期臺灣語言政策研究再考：以代行脫殖民化的視角來看〉；³⁴中國籍旅日學者鹿錫俊出版的〈從蔣介石日記所見在臺日本軍事教官諸相（1950-1953 年）〉等篇。³⁵

此外在戰後臺灣外交史領域，亦有數位日本學者在 2014 年分別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兩篇與歷史上的臺日關係相關，第一篇是前田直樹〈柳文卿・陳玉爾事件與日本國際特赦組織的成立——與日本相關之臺灣獨立運動的一個斷面〉一文，³⁶以同樣發生在 1968 年的兩起臺灣留日學生遭日本政府強制遣返臺灣事件，一為發生在該年 2 月的陳玉璽事件，³⁷一為 3 月的柳文卿事件，探討 1960 年代後期的日臺關係。這兩起事件的發生，均與當時日本佐藤榮作政府與蔣中正政府間的秘密協議有關。第二篇是田才德彥的〈日華斷交與日中邦交正常化——以自民黨內親臺派的行動論理為中

33 若松大祐，〈蔣介石《中国のなかのソ連》の歴史観：台湾から米華相互防衛条約を基礎づける〉，刊於《現代台湾研究》44（2014.3）：1-22；若松大祐，〈現代台湾史における泰緬孤軍イメージ：本土化の不徹底を示す一事例〉，《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9（2014.9）：59-94。

34 森田健嗣，〈戦後初期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研究再考：代行された脱植民化の視角から〉，《日本台湾学会報》16（2014.6）：107-125。

35 鹿錫俊，〈蔣介石日記に見る在台湾日本人軍事教官の諸相（1950-53 年）〉，齊藤道彦編著，《中国への多角的アプローチ（3）》（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181-201。

36 刊於《広島法学》38: 2（2014.10）：33-46。

37 陳玉璽在所有中文文獻中皆作「陳玉璽」，不知何故前田直樹的論文卻以「陳玉爾」稱之。參考覺蹊，〈陳玉璽事件——良心的囚人〉、陳玉璽在出獄後於 1972 年 1 月所寫的〈抗議聲明〉，以及臺灣警備總部對他的起訴書，三篇文獻收在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第一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06），頁 321-327。

心〉，³⁸ 探討 1972 年日本田中角榮政府決定與中華民國斷交過程中，自民黨內部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尤其介紹親臺派的論述和行動。

另外還有兩篇有關戰後臺灣外交史的論文，題材比較特殊，是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非洲的外交經營。這個題目與臺灣相關，是因為當時的蔣介石政府為了爭奪在聯合國內和整個國際間的「中國代表權」，持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非洲展開短兵相接的外交戰。這兩篇論文的作者和標題分別是：村上亨二的〈1960 年代前半中國經營非洲與臺灣的反應——以周恩來訪問非洲和法國對中國的承認為中心〉，³⁹ 以及中國籍之日本學者段瑞聰所撰寫之〈與 1950-1960 年代中國與非洲關係相關之臺灣因素——以「兩個中國」與中國代表權問題為中心〉。⁴⁰

四、國內戰後臺灣外交史研究

日本學界持續關注臺灣在跨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政治與外交發展，臺灣學術界對此的關注理應不會少。不過整體來說，2014 年至 2015 年有關戰後臺灣外交史的期刊論文並不算多，大略只有陳儀深〈台灣主體、中國屬島、或其他？——論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所揭露的美國對台政策〉；⁴¹ 許育銘〈冷戰時期東亞局勢下的琉球與臺灣關係——以 1966 年中華民國琉球友好訪問團為中心〉；⁴² 李福鐘〈1961 年美臺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爭議〉⁴³ 等寥寥數篇。倒是專書的出版，表現出較令人欣慰的成績，上文已經提過，2014 年由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黃克武主編的《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一書，以及 2015 年由國史館出版，呂芳上主編的《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

兩書皆為論文集的形式，內中收錄了多篇有關外交史的論述，包括王文隆的〈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際參與的調整〉2 篇；周琇環同樣有〈蔣中正與韓戰反共義士的來臺〉、〈美國的經援與軍援（1945-1965）〉2 篇；林孝庭〈從中、英文檔案看冷戰初期「敵後反攻」的實與虛（1950-1954）〉；趙席篁〈1950 年代的蔣中正與顧維鈞〉；許峰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1950-1960）〉等。或許因為這 7 篇論文被收錄進特定專書之中，使得期刊論文在數量上被挪用了。否則以單篇論文的發表總量來說，過去兩年戰後臺灣外交史的論文出版，仍超過十篇以上，成果不能說不豐富。當然，從這十篇論文的主題，可以看出一個研究趨勢，即有關 1950-1960 年代全球冷戰高峰下的臺灣外交史研究，明顯是近年的一個熱門話題。這個現象，多少與各國政府官方檔案的解密及釋出有關。冷戰的國際政治研究，正從 1950 年代逐步邁向 1960 年代，而且繼續往 1970 年代的歷史脈絡擴展中。

除了期刊及論文集，有關戰後臺灣外交史的專書出版，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間表現出尚稱不錯的成績，這主要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籌劃多年的《臺灣全志·卷七 外交志》（以下簡稱《外交志》）的出版。這一套總共六大本的《外交志》，由張勝彥帶領臺灣史學界外交史研究團隊，針對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的不同項目及面向，區分出六個主題：外交行政篇、外交政策篇、條約及協定篇、國際組織篇、對外關係篇，以及國民外交篇。詳述了整個中華民國外交體制的歷史過程、現狀及當前工作任務。

此外，其他的主題專書，有兩本值得特別介紹，一是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1949-1988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⁴⁴ 一是汪浩的《冷戰中的兩面

38 發表於《政經研究》50: 3 (2014.3): 437-480。

39 發表於《中國 21》39 (2014.1): 頁 181-200。

40 發表於《中國研究》7 (2014.3): 頁 91-120。

41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3 (2014.3): 133-156。

42 發表於日本《社會システム研究》129 (2014.9): 33-58。

43 發表於《台灣史學雜誌》18 (2015.6): 106-137。

44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1949-1988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公司，2015）。

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⁴⁵《台海·冷戰·蔣介石：1949-1988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一書標題雖然打著「解密檔案」與「臺灣史」的名目，然而事實上全書內容從 1947 年發生在中國新疆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交界的北塔山事件講起，第一章談的其實是美國在 1946-1949 年中國內戰中的角色。之後的章節自然屬於戰後臺灣史的範疇，不過本書敘述方式並非以學術界習慣的檔案文獻徵引的方式進行冗長論證，而是較偏向一般讀者熟悉的歷史故事書形式。這或許可以說是「冷戰史」逐步進入閱讀市場的徵候。

至於《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作者汪浩 1965 年出生於中國上海，雖然已經離開學術界，並從事金融業多年，然而本書係其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所改寫而成，⁴⁶ 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作者使用了英國外交部檔案，對於 1949 年以下英國政府如何辯論和制定對中國政策，以及影響對臺政策，作出了相當精簡卻周延的說明。

林孝庭和汪浩關於冷戰初期美國、英國與臺灣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歷史論述，再次說明冷戰研究在 21 世紀的 10 年代，看來確實仍是一個方興未艾，甚至是蒸蒸日上的領域。

五、結語

透過檢視 2014-2015 年間若干臺灣史領域新出版的學術成果，再次彰顯了兩百年來歷史學界顛撲不破的行規——新史料永遠是嶄新研究成果的發動機，但史料學派也永遠不會是唯一的王道，歷史學仍然期待廓大之解釋架構，以提供閱史者理解長時間脈絡的可能性，又或者是深入事件表象底層的精準切割刀。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不必是對立的概念，成熟的史學工作者，往往得以在兩種典範之間，悠遊自如。

儘管最近十餘年來被釋出的若干珍貴史料，例如二二八事件檔案的持續徵集和解密，又或者像是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固然一方面像是提供了學術論文生產線所需的原物料，帶動新產品源源不絕誕生；但另一方面歷史學家永遠被要求回答一些更加像鳥瞰高度的問題，例如「中華民國在臺灣究竟是什麼東西？」或是「如何解釋日本在臺灣殖民史？」等等。學術生產線對於維持相關從業員的開工率至關重大，但是試圖回答一些宛如「一百個為什麼」之類的疑問，仍然足以讓史學產品的賣相，更加可口誘人。這是我們期待歷史學界持續挖崛新史料、介紹新事證的同時，也同樣渴望新觀點、新論述的原因。

45 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臺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2014）。

46 同上註，頁 7。